

主持人语:人是自然界中的一分子,自然界各要素和人类社会均共存于“环境”中。各环境要素相互依赖与影响、共同促动及演变的历史,不再是单纯的自然中心或人类中心的视角,更讲求彼此的和谐与持续发展。这正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宗旨及目标,也是环境史学的价值及核心。

云南地处生态边界区、过渡区,生物资源丰富多样但生态系统较为脆弱,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中极为重要和特殊的区域。当前云南正面临着既要保护生态环境又要加快经济发展、改变贫困落后现状的双重压力,在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加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下,大力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及实践研究,全力推进生态文明排头兵建设,对云南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本期栏目推出两篇有关生态文明研究的文章。《环境史与生态文明的对话与交融》一文对在昆明召开的“生态文明建设与区域模式”学术论坛进行了综述,展现了学术界、社会、政府、民间等各个领域对于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相关问题的探索和思考,为当前乃至以后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指引方向。《绿色发展视角下云南贫困区美丽乡村建设对策研究》通过对历史中云南贫困区生态、社会、文化、资源等的梳理和探求,分析建设美丽乡村的潜力和局限,为云南贫困区美丽乡村建设的推进提出了相关对策和建议。

环境史与生态文明的对话与交融

——“生态文明建设与区域模式”学术论坛综述

崔思朋

(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北京 102488)

摘要:由云南大学主办的“生态文明建设与区域模式”学术论坛采取环境史与生态文明相关研究领域资深专家与青年学者对话的形式,围绕环境史与生态文明理论、云南环境史与生态文明区域模式建设、区外环境史与生态文明建设等三大主题展开讨论,深入剖析了环境史与生态文明之间的内在关联和相互交融的复杂关系,以及当前有关环境史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前沿和热点问题。论坛取得的成果,既推动了学界的相关研究,又为未来探索提供了有益的方向。

关键词:环境史;生态文明;生态文明建设;区域模式;环境保护;生态危机

中图分类号:X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639(2017)01-0047-12

DOI:10.14091/j.cnki.kmxyxb.2017.01.008

Dialogue and Blend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 Summary of the Academic Forum on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Regional Model

CUI Sipeng

(Graduate School,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China 102488)

Abstract: The form of the academic forum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Regional Model, sponsored by Yunnan University, is dialogues between senior experts and young scholars in the field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bout the three

收稿日期:2016-12-15

作者简介:崔思朋(1992—),男,黑龙江五常人,在读硕士研究生,中国环境伦理学研究会理事,主要从事清史、环境史研究。

themes involving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eory, Yunn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regional model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xternal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analyzed, and the frontier and highlights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re explored.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forum not only promote the academic research, but also provide a useful direction for future exploration.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history;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region patter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cological crisis

2016年8月16日至20日,由云南大学主办,云南大学服务云南行动计划“生态文明建设的云南模式研究”项目组、云南大学西南环境史研究所承办的“生态文明建设与区域模式”学术论坛在昆明举办。论坛开幕式由云南大学西南环境史研究所所长周琼主持,云南大学党委书记杨林、云南省环保厅生态文明建设处副处长李湘、南开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副院长以及长江学者王利华分别致辞。论坛参会人员包括来自德国海德堡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云南大学等三十多所国内外研究机构与高校的四十余位专家和青年学者。

本次论坛主要采用学术对话的形式。其一,环境史与生态文明的对话。环境问题的出现并非一蹴而就,是长期积累的结果,而生态文明谋求人与环境和谐共存、人类社会永续发展,因此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对环境历史的洞悉和对环境发展脉络的把握,离不开对环境历史发展和出现环境问题的辩证思考。其二,资深专家与青年学者的对话。论坛邀请了环境史与生态文明研究领域的专家、环保及生态文明建设政府部门的相关领导,青年学者则包括国内的大部分相关科研机构、高校的青年教师、博士后及研究生等。

通过本次论坛的对话,有效地推动了环境史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探讨、实践经验总结以及有关区域生态文明建设的模式和对策研究,为学界今后的相关探索提供了有益的方向和途径。本文现将此次论坛的主要学术观点综述如下:

一、环境史与生态文明研究

理论基础是学术繁荣与发展的根基,环境史与生态文明建设都以解决和反思人与自然关系和追求人类社会的永续发展为终极目标。环境史与生态文明的研究是本次论坛的基本内容,包括其理论及此二者之间的关系研究。

(一)关于环境史的基础理论研究

随着环境问题的日渐凸显,我国学术界对环境史研究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就目前学界关于环境史研究的成果而言,有关环境的研究大体有三类,即:作为自然史研究领域的环境的历史;作为“社会的历史”之研究范围的环境的历史;作为人与自然之关系研究领域的环境史。环境史与环境的历史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后者尤其值得重视。^[1]本次论坛中,对于环境史的理论讨论集中于几位国内较早涉猎环境史研究的专家——南开大学的王利华教授、清华大学梅雪芹教授、北京大学韩茂莉教授等。他们分别以不同的视角对环境史理论加以解读。鉴于学识储备,青年学者在本次论坛中对基础理论研究未见诸文字。

王利华在《环境史研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意义》一文中认为,中国古代是农业文明高度发达的社会,由最初的粗放农业到后来的精耕细作农业,人和土地之间关系日渐紧密,人被高度束缚在土地之上,受此影响出现并逐渐形成了稳定的家庭和族群关系。王利华坚持以“生命中心论”为出发点,以中国古代的“农业史”和“家庭史”为切入点,通过分析人对土地与生物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对环境的影响,论述了环境史的基本内容、范畴等,廓清了中国古代环境史研究的基本理论基础及特征。而梅雪芹则在《环境史与生态文明建设》一文中以世界史(尤其是世界近代史)为切入点,通过回顾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出现的生态反弹和环境史研究的兴起与发展,论述了其对我国环境史研究的影响及可资借鉴之处,并通过对当前国外环境史界的多部重要研究论著的剖析,认为我国环境史研究的基本理论应包括环境史研究的起源(“富困”问题)、历史研究的视角(上下左右的历史)、研究的方法(跨界别与实践)、评介标准(以自然为镜)、考评、分析与功能(回溯性的环

境影响评价)等,以期实现生态史学(家园史学)的构建。

与上述中外两种对环境史理解视角所不同的是,韩茂莉在《历史时期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报告中以历史时期气候波动与人类活动为切入点,对历史时期气候的冷暖、干湿变化对人类生存、历史时期植被地理分布变化、农业活动变化的影响做了分析,基本上廓清了历史时期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发展历程、基本特征及其影响。此外,韩茂莉还对“人类活动与环境变迁”和“环境变迁与人类活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辩证思考,指出人类对环境的认识和适应经历了人类社会初期(即旧石器时代)的单纯利用环境,即大自然有什么就利用什么,此后由于人口增长引起的食物短缺而导致人与环境之间关系的变化而被迫适应环境,体现在农业文明的“农业—物理性变化—可逆”、工业文明的“工业—化学性变化—不可逆”的历史发展,以及由此对环境造成的破坏和引发的生态危机。这对于理解我国环境发展史具有重要的启示。

环境史是对历史时期生态环境问题的研究,也需依托一定的资料与方法。就云南地区的生态环境历史研究而言,白玉军以云南地区的中小流域为考察对象,在其论文《云南山地生态环境史研究的资料与方法——以中小流域为中心的历史考察》中认为:对云南地区山地生态环境史研究应坚持多学科、多源数据与多种技术手段相结合的方法,具体而言,云南地区生态环境史研究的资料与方法包括历史文献解析、田野调查、科学技术手段、学科交叉、科学理论运用等几方面;并强调环境史研究应以问题导向的分析性史地研究为主,而不能简单地停留在叙事史学层面,应以历史叙事为核心,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事件序列转化为叙事的研究模式;此外对云南地区的环境史研究,尤其须注重以中小河流聚落为空间尺度进行的田野调查,细致地认识山地环境演变的时空过程及其复杂性。在论坛互动提问环节中,王利华也就环境史研究的依托资料与研究方法做了经验介绍,指出环境史研究除利用传世历史资料外,还应结合田野调查、传世实物资料、可应用于环境史研究的多学科理论等方法。

(二)关于生态文明的基础理论研究

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研究自生态文明在我国兴起以来就被学界所关注。夯实基础理论研究是筑牢学术繁荣的重要根基,基础理论研究对于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2]本次论坛也就生态文明的基础理论研究进行了讨论,其主要观点如下:

贾卫列在《关于生态文明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援引现代生活中人类生存之本的绿水青山遭到破坏的状况,以及生态文明是人类未来生存与发展的必由路径等论断,就为何研究生态文明与生态文明的内涵做了论述。他指出,生态文明是人类适应、利用自然过程中建立的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产方式,包含三层含义:1. 人类文明发展的新时代——生态文明是在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基础上的人类文明新时代;2. 社会进步的新的发展观——生态文明观;3. 是一场席卷全球的以生态公正为目标、生态安全为基础、以新能源革命为基石的全球性生态现代化运动——生态文明建设。此外,贾卫列还对生态文明与人类生态期、可持续发展、传统文化、生态安全、新能源革命、绿色发展、科学技术、信息文明、环境保护、国土开发、绿色生活等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阐释。

生态文明建设属于我国的一项政治行为。张修玉在《生态治国,文明理政——试论后现代生态文明观》中指出,生态文明建设是实现中国梦与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然选择,生态文明理念研究与建设包括:“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一大指导理念;“两山理论”的两树实践模型;生态优势区、经济优势区与均衡发展区等三种分区管理;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全面促进资源节约、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等四大目标任务;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五条建设路径;构建与发展科学合理的生态空间、生态经济、生态环境、生态人居、生态文化、生态制度等六大建设体系;组织、制度、机制、资金、技术、人才、舆论等七大系统保障;区域生态文明、行业生态文明、发达地区生态文明、少数民族生态文明、台港澳生态文明、生态文明数据管理、生态文明工程实践、生态文明政策战略等八大重点工作

任务;生态文明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美丽中国、生态文化与生态环境等六大建设体系;科学发展、新常态、中国梦、人类福祉、一带一路、传统哲学、后现代主义等之间的十大关键关系。

与上述对生态文明理解视角不同的是,尹绍亭从人类学视角出发,在《生态文明论——文化人类学的视角》中认为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组成部分,是不同时代人类认知自然、适应和顺应自然规律、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维护人类与生态环境和谐共生的知识、技术、教育、伦理、道德、信仰、法制的综合文化生态体系。吴兆录则以生态学视角为切入点,在《保护性利用生物资源的云南民族生态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中认为,生态文明应坚持以科学技术为基础,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狭隘文明意识,利用人类的生态智慧促进“环境—生物—人类”的整体协调演进。徐俊六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视角出发,在《生态文明视野下旅游区洋人街的现状与发展探究》中认为,生态文明是继农耕、工业文明后的另一种文明,文明是生态文明的根本和主流,代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但其中也存在不文明的表现,甚至产生各种矛盾关系和利益的博弈。刘少航立足于生态危机与文明发展之间的关联,在《“生态危机”何为?——一个“问题史”的回溯与思考》一文中认为:生态文明建设中需要洞悉生态危机,生态危机曾毁灭过很多人类历史上的文明,且对现有文明构成了潜在的威胁;从生态哲学层面来说,深生态学更是提出生态危机源于文化危机,需要生态智慧去解决;当今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明确所面临的生态危机,尊重历史的共时性与历史性。

除此之外,陈茜从文明发展的角度出发,在《生态文明视野下贫困原因与减贫路径的思考》中指出,生态文明不是简单的生态文明建设,而应当是建立在反思工业文明扩张史基础上所构筑起来的新型文明类型。李静则从参与者的角度出发,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行动逻辑——基于政府、企业、社会的三维分析》一文中认为: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民参与,政府、企业和社会三者之间的有机结合和协同配合;应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企业的关键作用,以及社会的合力影响,三者精准定位,相互协调补充。田挺立足于生

态文明建设,在《必要的思维转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中强调: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生态文明建设必须采用新思维,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生态文明走向中国政治生活和谐领域的前提是政府、社会、民众之间必要的思维转换,梳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思路。汪庆春则在《永续发展视域下的生态文明建设与实践》中阐述了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的历史特殊性,指出需要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中值得借鉴的生态思想,结合“和”“天人合一”等思想,为实现永续发展提供更具参考价值的理论体系。

生态文明研究已成为我国当下社会各界的关注点,出现了“对‘生态文明’滥用、随意使用的情况”。有鉴于此,周琼在《警惕与责任:生态文明研究及建设中的“泛化”问题初论》报告中对生态文明研究中存在的“泛化”问题进行了批判性思考,认为当下“生态文明”已经成为中国最吸引人眼球的名词和国家战略,在生态文明研究与具体实践、学术研究中都存在生态文明的“泛化”使用现象。此外,她还指出,当下中国学术研究中应注意树立研究者的社会责任感及使命感,高度警惕生态文明不同形式的泛化现象,要注意生态文明建设的跟踪调查研究,注意多学科视角与研究方法的结合,关注本土与传统生态思想,并建立政府与学术及官方和民间的沟通和联动机制,通过多维视角注重对生态文明的规范性使用。

(三)环境史与生态文明之间关系的研究

对于环境史与生态文明之间的关系而言,韩茂莉认为历史研究的一个关键点在于对人类所走过的相同历史阶段和过程的反思和总结,环境史的研究对于当下生态环境保护与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当前的全球性生态危机与人类生存问题都需要追溯与反思历史。韩茂莉还列举了全球变暖对我国绿洲农业发展和青藏铁路建设的影响,并对环境史研究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做了深刻剖析。王利华则以中国环境史发展过程中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互动为出发点,提出了环境史是一种强烈表达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模式,具有高度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的观点,认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对我国环境发展变

迁概况与历史时期环境问题有所了解,通过对历史时期中国环境发展变化情况的分析,能更好地应用于当下生态文明建设与环境问题的治理。梅雪芹则明确指出,环境史研究有助于理解生态文明,实现生态文明建设,有助于提高人类自觉摆脱生态危机,是帮助人类探索新的文明形态的一种有效途径,因此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与环境问题治理离不开对环境发展史的洞悉,强调了环境史研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

在具体实例方面,陈鑫以生物保护为切入点,在《白族传统精神文化中的生态伦理思想探究——以生物保护为例》一文中,对白族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思想进行了分析,指出白族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在云南地区活动,白族先人自古即形成了人与自然之间的朴素认识,树立了万物平等共生、万物有灵的原始生态观与生物保护观,形成了自然崇拜、图腾崇拜、本主信仰等宗教文化趋势下的生物保护观念,以及白族的习惯法、礼仪制度、习俗文化的生态价值,因此白族的传统生态文化对于当下本民族、云南地区以及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冯亚端则在《浅谈云南傣族谚语中的生态文明思想及其当代价值》一文中对傣族流传下来的谚语中的生态思想加以解读:傣族谚语中包含着敬畏自然、尊重自然的思想,人与自然彼此依存、和谐共生的思想,关爱自然、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自然的思想,而这些有益的传统生态思想也是目前生态文明建设所不可或缺的思想源泉,在生态危机逐渐严重的今日,应创造性地把傣族谚语中的生态思想精髓加以开发,为我国生态文明体系的构建与建设服务。张富国在《生态伦理视阈下云南少数民族生态文明建设》中认为:云南作为少数民族聚居区,其生态文明建设需要结合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性,充分发掘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万物有灵、可持续发展等生态思想精髓,服务于当下;不仅如此,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也应该结合现代化思想,坚持以生态环境保护为前提,建立完整的生态保护制度,进行全面生态安全与传统文化教育,组织开展国际合作及坚持绿色协调发展等。

二、云南省环境史与生态文明区域建设研究

云南省是我国西南地区的重要生态屏障,同时本省的生态环境也具有复杂性与多样性。当前,云南省生态文明建设及生态形象塑造,虽然具备了良好的环境资源条件、文化优势和品牌优势,但仍存在着生态意识薄弱、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矛盾、生态文化传承后劲不足等问题。^[3]本次论坛中,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对云南环境史与生态文明的研究与建设进行相关探讨。

(一)云南少数民族环境史与区域生态文明建设研究

云南是少数民族聚居区,云南多彩的文明可以说是各民族共同缔造的,而其独特的历史文化更带有深厚的少数民族特色。因此,对于云南环境史与生态文明建设研究均离不开对本区域内少数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及民族文化的探讨和了解。正如刘豪所言:“云南地区的民族文化蕴含着巨大的生态价值,其宗教文化、文学艺术、传统习俗等对当地的生态保护起到了促进作用”^[4]。本次论坛中,吴兆录对云南省内的滇西北藏族地区的神山信仰与轮牧系统、彝族地区的森林崇敬与保护、哀牢山地区哈尼族的森林-梯田生态文化、西双版纳傣族布朗族地区朴素生态观与传统文化景观的历史做了追溯,对其生态价值进行了论述,并对其与今日生态文明建设的可资借鉴之处做了阐释。就具体民族与地区而言,赵颖则在《月湖水环境变迁背景下的生计实践研究》一文中对石林彝族自治县境内月湖村水环境加以考察,认为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遵循着物质能量守恒定律,二者存在着直接影响。对于月湖村,新中国成立后大规模的开田,特别是二十一世纪以来烤烟的大量种植对当地农业、渔业等传统产业造成的排挤,使得当地水域环境、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出现了河流干涸、地下水位下降、断流、林业资源退化、动植物资源减少等生态恶化,破坏了“能量守恒”,当地生态文明建设需要结合当地的传统文化与产业,才能有效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石晴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以富民县小水井村为例》论文中,通过对昆明市富民县永定镇东北

19km的小水井苗族村的生态环境的实地考察认为,当地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应坚持生态文明建设与乡村旅游协调发展、因地制宜突破创新发展、强化服务与突出特色和打造品牌、建设与保护并重的思路,同时需完善村规民约与健全基层组织,坚持生态文明建设与旅游项目开发过程中的一致性,并围绕如何提高农民素质与强化生态文明理念、政府扶持与村民共同参与当地生态文明建设、处理好旅游开发与传统文化的传承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意见或建议。

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具体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徐淳在其《元明时期大理、鹤庆的水神信仰——生态文明视角下的水与人》一文中,通过对元明时期大理、鹤庆地区对水神信仰的考察认为:在当地流传下来的关于龙神的崇拜及与恶龙之间的争斗故事中体现出了当地人对水资源的合理使用与崇敬,就这一维度而言,探讨生态文明建设需要考察水作为一种自然资源和文化要素的作用;中国生态文明观的研究离不开人对水的利用概念的探索,通过对历史上的人水关系加以探索能更好地理解与建设生态文明。作为云南地区极具优势的森林资源,云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在与森林的长期交融中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森林文化。何梦竹在《云南少数民族森林文化及其生态意蕴》中认为,云南少数民族的森林文化具有重要的生态价值,表现出天人合一的生态观、人与动植物之间无所不包的联系与关照、人对自然的利用与回馈的生态意识等,这也预示着当下的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本着尊重自然、按客观规律办事的原则,保护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态平衡,实现可持续发展。此外,在粮食资源方面,作为人类基本生存需要的粮食,由于明清以来人口增加,导致了对粮食需求的增加。耿金在论文《清中后期云南矿区米价波动与驱动因素分析——以滇东北为中心(1736—1911)》中,考证了以清中后期滇东北矿区米价波动及其成因,得出了在当地米价的波动中矿业兴衰发展与米价之间呈正增长,以及交通成本与杂粮化的种植结构变化是影响米价变动走势关键因素的结论,认为米价的波动是导致粮食种植结构与种植面积变化的重要因素,对当地环境的影响不容小觑。就云南地区的具体生态文明

建设而言,秦文丽的《云南少数民族生态博物馆与生态文明建设研究》一文则从博物馆建设的视角出发提出:云南作为少数民族聚居区,应该结合生态文明思想建设生态博物馆;少数民族生态博物馆建设可以最大化地保护和利用少数民族地区的优势资源,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生态博物馆建设以村落(社区、村寨)为单位,旨在保护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以及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实现生态文明建设。

(二)云南省内区域环境史与生态文明建设研究

云南地区省内的区域环境史研究与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对当地地域特殊性的探讨和关注。林超民在《黄金纬度与生态文明》中指出:云南中部位于北纬 25° ,海拔在1 000~2 000 m之间,气候温和,雨量充沛,物产丰富,是宜于人居之地,云南地区亦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因此云南位于黄金纬度线;而近世以前的云南地区生态环境较为良好,但随着近代以来的生态破坏,导致云南地区生物多样性、生态和谐性遭到了严重破坏,因此很有必要对历史上云南地区的生态环境加以追溯,对本地区生态环境发展脉络有所熟悉。

就云南省的生态文明建设而言,林超民认为云南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立足于云南省复杂的地形、多样的气候、纷繁的文化等,因地制宜,敬畏自然,保护自然,以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终极目标。而黄小军认为,云南省具有良好的生态环境,也肩负着维护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的重任,同时云南省也是生态环境脆弱区、经济欠发达区、民族聚居区,现阶段云南面临“重工业太重,轻工业太轻”的不利局面,生态文明建设在资源与经济开发、生态文明建设保护机制、资源利用与保护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因此云南生态文明建设需要认真落实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实施方案、增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法制保障、以科技创新提升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以脱贫攻坚夯实生态文明建设基础、加快建设主体功能区以及全面推行环境综合治理等六项举措。

对于云南省具体区域的生态文明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的问题,与会学者认为,应结合当地的具体环境而有所针对性地开展,较之行政区域划分,

生态系统具有自身的完整性与内部协调性,是不以人的主观意愿划分而能够区别对待的。尹绍亭通过讲述昆明“翠湖人鸥情”的故事,生动描述了自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起每年秋冬之际数万只红嘴鸥从西伯利亚飞抵昆明翠湖过冬的情景,显现出新中国成立后大肆开展的围湖造田与环境破坏对红嘴鸥生存造成的影响,同时也因环境破坏而使人鸥之间结下了深厚的情谊,重塑了“人鸥生态文化系统”,由此阐发了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借鉴意义。作为城市生态系统,城市的发展是工业革命的结果,然而相当一部分地区的城市兴起对环境产生了严重的破坏性影响。张保立以改革开放以来云南城市发展对环境的影响为切入点,在《浅析改革开放后云南城市发展中生态形象的构建》一文中,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云南城市因突飞猛进式的发展而导致的资源耗竭、人口数量增长以及城市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提出当下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构建云南城市发展背景下的生态形象,也即实现人与城市的和谐状态、人与自然之间的高度和谐程度、自然与城市之间的和谐关联等,打造一个良好有序的云南生态城市形象。在森林系统方面,方晓以中缅边境地区森林火灾的预防与扑救为例,在《云南生态安全维护的跨国区域治理——以中缅边境地区森林火灾预防与扑救为例》中,对跨区域的生态环境保护与生态安全维护进行了探索并指出,中缅边境地区的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一方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会影响到另一方,因而需要结合中、缅双方的利益与调动双方生态环境保护的积极性,以实现当地生态环境的跨区域管理,维护整个边境区域的生态安全。就水域环境而言,澜沧江是亚洲第三大河流,也是东南亚地区第一长河。刘荣昆通过对云南境内澜沧江彝族聚居区的生态考察,在《澜沧江流域彝族聚居区生态文明建设对策探究》报告中指出,传统文化的淡化易于引起生态环境状况的滑坡,因而传统文化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弥足珍贵,因此澜沧江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中应充分挖掘澜沧江流域彝族的传统生态思想,促进澜沧江流域彝族聚居区的生态文明建设,以传统文化为内涵培育环保意识,依托山地环境开展美丽乡村建设,以及因地制宜开展生态农业建设,以此探索出一条传统文

化应用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可行路径。霍仁龙则以掌鸠河流域为调查对象,在《近300年来西南山地的人口发展、土地开发与环境变化——以掌鸠河流域为例的研究》一文中,对西南山地近三百年来的人口发展、土地开发与环境变化之间的关系加以考察,指出明清以来因改土归流、咸同时期回民战争等的影响造成了流域内的移民增加,致使山区土地大量开垦,使得半山区和山区的耕地数量增加,山地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由此导致了自然灾害的频发,对此当地减灾与防灾工作需要控制山区耕地的继续扩张,采取适应当地山地自然环境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以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再如滇池,作为我国的第六大淡水湖及云南九大高原湖之首,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因围湖造田而导致该水域的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破坏。李洋在《1970年代滇池地区的围湖造田运动及其当代启示》中历数1949年以来滇池地区开展的围湖造田、向滇池要粮等活动,叙述了滇池水域环境由此被逐步破坏的过程,指出围湖造田对滇池生态环境的破坏以及在人定胜天思想的驱使下,虽然能够在短时期内获得粮食与土地的增加,但环境代价却是非常巨大的,因此在推动云南高原湖泊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中,一定要从围湖造田的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然而,不可规避的一个现实是,云南省近些年来的土地利用仍呈现出耕地、草地、未利用地不断减少,各类建筑用地不断增加的趋势。李儒童等通过对《云南统计年鉴》《云南统计公报》《中国物价年鉴》等资料数据的分析,以及土地利用变化量对不同时期土地利用类型总量的统计与测算,得出云南省的土地利用在近十四年内草地和耕地的生态价值不断降低,林地、水域和未利用地生态价值增加,以及云南省生态总价值呈现增加趋势的结论。

另外,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极端性的过度人口密集与活动对环境造成的破坏性影响亦不可小觑,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徐俊六以大理洋人街旅游区的考察为视角,指出洋人街现阶段呈现出开发过度、发展无序、低俗文化泛滥、文化移植、街道脏乱差、占道经营、经营者与原住民居民争夺利益、经营者与城市管理者之间无序博弈等问题,而这些问题又都相同地作用到环境上,对环境产生

了严重的破坏性影响,认为洋人街是旅游区的一个缩影,关系到旅游区及整个地区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因此洋人街的可持续发展应当积极引入生态文化,打造多元文化融合的文化形态,以此促进当地的生态文明建设。

(三)生物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文明

生物是自然界最为活跃的因子。生态危机的出现也体现在对生物资源的不合理开发与利用上,因而生态文明建设也离不开对生物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与保护。张冠凯根据唐代基本史料《云南志》《新唐书》《通典》中对南诏地区动植物的记载,以唐代为时代视角,对历史上云南地区的动植物资源(包括人工种植饲养与野生)进行了介绍,展示了云南地区自古即为生物多样性的分布区,同时还就云南地区丰富生物资源同人类生活之间的关系做了介绍,展现了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的生态性。立足于生态文明视域下生物资源的利用与保护,吴兆录认为生态文明应坚持以科学技术为基础,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下对自然毫无节制的利用、对自然的征服改造等,坚持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吴兆录以植物学与生态学的视角为切入点,认为云南地区的生物具有多样性,生态环境的维护离不开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利用。

事实上,生物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与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维护是实现云南地区生态文明建设乃至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之一。就这方面,吴良早在《昆明城区大学校园与公园绿地植物构成及其文化研究》一文中对昆明城区22所大学校园及公园绿地植物进行了调查,发现绿地物种多是被子植物,在记录的共计716种植物中,草本占46.51%,乔木占27.79%,灌木22.49%,藤本3.21%,而这些植物中外来物种占绝大多数。这体现出人为的生态系统构建,是对当地传统生态系统的极大破坏,其效益优劣尚未可知。吴良还指出,本地区的优良传统植物文化的保护,有利于实现珍稀濒危物种的保育工作,而保护当地生物物种的多样性,在提高城市绿地植物文化服务功能、改善城市绿地环境、丰富市民精神文化、提高生活质量方面都有重要作用,因此当地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对本地区优势物种与传统物种的保

护和开发。

生物资源纷繁复杂、种类繁多,其中有一部分为可食用的,也有部分为使用与食用功能兼具的,这是维持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关键。王宇丰通过对历史时期云南糯稻种植史的梳理,在其论文《生态人类学视角下的云南糯稻资源》中对现在外来杂交稻的大肆推广、糯稻品种和种植迅速消亡的情况做了介绍。他指出:糯稻种植在云南具有品种多样性、历史悠久性,是维护云南生态安全的重要生存资源,因而具有重要的生态效益,而当下云南糯稻栽培逐渐萎缩、消失,对生态安全、经济发展、社会生存等都造成了严重破坏;鉴于此,目前需要深思地方品种的保护、外来品种的推广、老品种保护与新品种推广之间协调等三方面的问题,这也是保护和恢复云南生态环境和谐的关键一环。另外,在论坛上,张辉在其《生态文明视角下的竹利用与生态适应——基于云南省BL大寨拉祜族的生态人类学调查》一文中指出,当地的地理环境与气候对竹子的生存和竹资源的扩大有重要影响,竹子已深入拉祜族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饮食、日常生活器物、生产工具、建筑材料、乐器等多方面,可以说,BL大寨遍植竹子,在与竹子的长期相处中,形成了独特的拉祜族“人竹”生态体系,竹子资源也具有了重要的生态价值,即在当地形成了竹文化景观生态、竹林对气候的调试、竹子对水源及水土的涵养与保持、生态的竹制品等等,因此区域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充分发挥当地的生态资源与文化,以此维护当地的生态系统。

就生物多样性保护而言,魏晓欣在《民族地区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的多元保护机制》中指出:民族地区具有生物多样性特征,而在民族地区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传统知识,其保护途径包括民间法、宗教、地方传承人等三种;尤其是当下社会转型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时期,很有必要探索能够契合民族地区特色,相互补充、相互促进、价值渗透的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的多元保护机制,以利于益于区域生态文明建设。赵晓燕就勐腊县的生物多样性及其保护做了深入探讨,在《生态文明建设视角下勐腊县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一文中指出,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条件,保护生

物多样性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勐腊县作为中国乃至全球生物多样性研究的热点地区之一,也是中国西南的生态屏障。然而,由于近年来人类活动的加剧,对当地的环境破坏逐渐加深,导致物种逐渐减少,其生态环境完整性与稳定性遭到破坏。有鉴于此,地方政府应该把工作重心从以经济建设为主转移到以生态建设为主上来,建立各级统一的领导协调机构,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与生态发展规则,吸引或争取各方力量积极参与到生物多样性保护中来,同时建立和完善生态保护区管理体系,以此实现可持续发展,保护生态环境,推动人与社会、自然与人之间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

三、区外环境史与生态文明建设研究

云南省环境史研究与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借鉴区外包括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先进经验。刘少航曾指出:“中国生态文明思想渊源于西方的生态学理论,当代西方对中国当代环境变迁的历史和中国生态意识的变迁有着非常敏锐的观察,并在研究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质疑和建议。中国面向西方时也有着自己关于生态文明的解读,在西方舆论界发出自己声音的同时也希望能够进行中西方关于生态文明的对话。”^[5]本次论坛中,部分学者就中国其他省份地区及国外的环境史与生态文明的研究状况进行了交流和探讨。

(一) 区外环境史研究

所谓区外即是指云南之外地区的环境史研究,包括除云南省外的中国其他省区及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及地区。

就云南省外其他区域的环境史研究而言。“关中—天水”地区是我国最早出现城市群雏形的地区,目前也是我国西北地区城市最密集的区域。王挺通过对明代以来“关中—天水”地区的城市湖泊和池沼的考察,在《明代以降关中—天水地区的城市湖泊与池沼》一文中深入剖析了这些城市湖泊的实际功能与演变。其研究发现,明代以降的这一地区至少有24个城市拥有湖泊、池沼等,按其补给水源可分为“渠水”“泉水”“雨水”三类,而

如今这些城市的湖池多以湮塞,仅凤翔东湖、西安莲花池等少数湖池得以延续。这些水域是城市重要的水资源,也是调节城市生态平衡、维持城市生态系统的关键,因此当地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对此予以关注,充分借鉴历史上的先进经验,对本地区的湖池破坏予以重视。大别山是中国南方的重要山区,也是长江、淮河水系的天然分水岭和重要的水域环境。沈志富以历史时期大别山水利开发与利用为视角,在《水利的限度:基于历史时期大别山区灌溉水利开发与环境变迁的考察》一文中,历数了中国古代各王朝对大别山水利的开发与使用情况,并就其利弊得失加以评述。沈志富认为,过度的水利开发虽然可以取得暂时的山田水稻种植规模及灌溉效益,但从长远看,山区水利的过度开发造成的环境代价却是显著的,同时也导致了平原地区水利设施的荒废,最终致使本区域内生态功能的衰退,因此当下大别山区水利开发建设,应立足于整个流域,兼顾上下游经济社会的平衡和选址适宜的自然条件,因地制宜地适度修建水利设施,以此达到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最大化。

我国北方草原是重要的生态区域,也是地球上重要的生态屏障。崔思朋在《游居之间:内蒙古草原游牧民族传统土地利用方式的生态经验与启示》中,对以内蒙古草原为代表的草原游牧民族传统土地利用方式和人与土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调查与分析,从生态维度剖析了游牧民族游而牧之的生产方式、游而居之的生活方式、游而存之的生存方式,并通过与农耕民族的土地利用方式、观念、投入、媒介、技术等方面的不同对比,揭示了游牧民族土地利用方式的生态性。崔思朋认为,游牧民族恰如其分地认识到了其与土地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在合理利用土地的基础上,实现了游牧民族与土地之间的和谐,因而游牧民族的土地利用方式更具生态价值,在当前严峻生态危机的背景下,其对当地乃至全国的生态文明建设都有较高的借鉴或指导意义。

在国外环境史研究方面,王俊勇则通过对美国黄石国家公园灰熊管理的分析,对灰熊物种演变与生态环境变迁之间的关系做了探索。他在《美国黄石国家公园里的灰熊管理与科学》一文中指出,自1880年起,灰熊便成为黄石公园游客的

必览之处,随着人与灰熊接触的增加,人熊之间冲突也增多,灰熊管理成为一大难题,而灰熊是整个黄石公园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也是生态系统健康与否的指示器,因此其管理需要处理好人与灰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过度的人为干涉会破坏生态平衡,百余年来灰熊管理积累下的经验与教训是值得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借鉴的。

再如美国西部地区,其土地开发伴随着美国历史而开展。鲍威尔曾先后四次组织西部探险活动,并对美国西部地区提出了开发的设想。颜蕾在论文《关于鲍威尔西部开发的设想研究》中对鲍威尔的西部开发设想进行了梳理与分析,并指出鲍威尔的西部开发思想超越了当时的现实环境,注定是无法完全推行的,然而鲍威尔的西部开发设想却是重要的生态思想遗产,为进步主义时代的资源保护提供了参照。事实上,对人类历史上的生态思想进行批判性接受或借鉴,对我国当下的生态文明建设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作为工业革命发源地的英国也因工业的飞速发展而导致伦敦出现烟雾污染的问题。赵思安以城市结构分析为视角,在《工业革命后伦敦烟雾问题初探——从城市结构角度分析》中对工业革命后伦敦的烟雾问题进行了探讨,指出工业革命以后的伦敦城,其人口和企业大量增加,且集中在市内亦未能进行合理的功能分区,同时当时伦敦城内植被逐渐减少,绿化严重不足,难以达到空气净化的目的,这导致了伦敦的烟雾污染难以控制,然而今日伦敦已被评为宜居城市,城市绿化居全球前列,其环境问题得到了有效治理,其治理经验值得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参考和借鉴。

再如亚洲印度洋地区,它是地理大发现之后人类的重要移民区。朱明通过解读 Sunil S. Amrith 的《穿越孟加拉湾》一书,对印度洋地区的移民及对当地生态环境的影响做了评述,同时指出孟加拉湾地区历史上的移民与反移民体现了从跨国流动到民族国家封闭边境再到新迁移出现的长时段变迁过程,与这种迁移同时进行的是环境的变化及对该地区的反作用,这为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经验和教训。

(二) 区外生态文明建设研究

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

就是贫困问题。论坛中,梅雪芹也就“富困”问题与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关联性进行了阐释,认为贫困是生态文明建设绕不开的一个客观实际。陈茜则专门就生态文明视域下的贫困问题与减贫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影响做了深入的剖析,指出生态文明与减贫是全球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导致贫困出现也是由多方因素促成的,贫困问题的解决需要做到:第一,探寻生态环境贫困的减贫路径,从实际出发,分类指导;第二,需要借助相关经营原理和族际关系论来解决生态文化贫困问题;第三,生态权益贫困的减贫路径需要从内、外部两部分进行完善;第四,生态能力贫困的减贫需要通过提高孳生能力和改善生境能力两方面入手。综合言之,就是通过减贫,实现经济发展、减少贫困和生态维护、生态修复的良性互动。

乡村是人与环境结合的重要区域,而近些年来受返乡高潮的出现,以及乡村地区自身谋求发展导致一些无原则、无底线开发行为的影响,乡村环境出现了严重破坏。刘青以乡村旅游业发展为视角,在其《乡村低碳旅游发展的价值、机制与模式构建》一文中认为,乡村旅游虽然在繁荣农村经济、优化产业结构、增加农民就业机会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新世纪以来的乡村旅游也导致了农村生态环境恶化、乡土文化被侵蚀等现象,因此低碳经济理念是乡村旅游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式。具体而言,除了政府主导的构建功能健全、分工明确的乡村旅游管理体系应该成为发展乡村低碳旅游的制度和组织保障外,同时还需依据不同区域实施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具体目标,通过大规模的实地调查和数据挖掘,科学地编制乡村低碳旅游发展规则,并且在综合考虑技术和成本等因素的基础上,认真落实全流程碳减排措施。

在涉及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崔新婷在论文《杂而有序的乡土草:差序格局视角下的城市化观》中比较了北京市正在实施的两种绿化模式,即以频繁拔天然草、浇水、修剪、清除落叶等精细管理为主的模式,和以尊重自然规律要求乡土植物不少于70%且落叶覆盖土壤的粗放管理模式,并认为这两种模式在对待乡土草方面相互矛盾。该文指出,杂草具有动态多维的差序格局,即根据季节气候次第生长的纵向时序格局,和不同种类

和年龄的植物和伴生动物等构成了同一时点的横向异质性依存格局,并以单一植物马唐草和天然植物群落为例,通过已有文献资料论述了杂草具有浇水少、消减雾霾、降温、吸收重金属污染、修复土壤等重要生态价值,建议我国城市绿化应转变观念,回归传统生态文化自信,落实“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中央精神,依循乡土草的差序格局让野草长,废止拔天然草等破坏城市生态的、错误的精细管理绿化方式。刘凯的《生态文明视角下中国地级以上城市绿化空间格局与驱动机制研究》一文则在分析绿色化内涵的基础上,运用综合指数计算了2014年我国的289个地级以上城市的绿色化水平,并利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探讨了地级以上城市绿色化的空间分布特征。作者指出,地级以上城市绿化整体呈现出从东南沿海向西部内陆递减的趋势,绿化指数从高到低的衰减速度呈现由快减慢且加快的趋势,并且具有自东向西由热点逐步过渡为冷点的空间格局。刘凯认为:当下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对城市空间的绿色化予以关注,提升城市的生态功能;此外,城市的土地利用多为建筑用地,多为直接破坏土地生态环境的利用方式,因此城市土地利用与生态保护之间存在尖锐的生态冲突,这也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所需予以重视和面对的客观现状。曾昉在《城市土地利用生态冲突协调机制研究》中以贵阳市花溪大学城建设中产生的土地利用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冲突为例,就城市用地与生态维护之间的冲突进行了论述。曾昉指出,协调这一冲突应建立冲突协调机制、公众参与机制、生态补偿机制与法律保障机制等,以实现生态文明建设时代的城市生态环境维护。除此之外,王瓚玮以大地震导致的唐山生态破坏为切入点,在其论文《城市之殇:生态脆弱与唐山百年发展中的震与霾》中认为:地震改变了人的生存环境,影响了人的身心健康状况,灾后唐山在内忧外患的背景下开启了举步维艰的工业化进程,成为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然而与突飞猛进的工业化相伴而生的却是日渐凸显的生态危机,这也是人类过度重视经济发展而忽视环境代价的后果;唐山灾后重建及导致的生态危机深刻说明,人类面临无法规避的自然灾害时,只能用

向自然俯拾身躯的姿态来重新整肃社会系统的发展形势,唯有如此,人类才能在不断适应和调整中尽力减少脆弱性危机转化为现实灾害的可能性,以及在灾后进一步减轻灾害的负面影响,实现灾害之后社会的平稳发展。

在生态文明建设与法律之间的关系维度方面,罗艺在《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的实践探索——以生态城市建设的法制保障为视角》一文中指出,加强生态文明的制度建设,首先必须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有明确的界定,不能泛泛而论,也不能无限扩展外延,最终应当把落脚点放在制度建设上。目前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存在问题是如何实现观念层面的理念转变以及实践层面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生态城市建设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探索,创建生态城市是生态文明的重要实现途径和具体表现形式。当下,全国各地虽然掀起了生态城市建设的热潮,但生态城市建设亦存在不少问题,比如:对生态城市建设的定位不明确,出现“生态城市”“低碳城市”“生态低碳城市”“生态园林城市”等城市建设不同概念,建设实践陷入迷茫;保障生态城市建设的制度不完善;等等。从国内外的实践来看,生态城市建设必须有法制保障,就我国目前的法制保障在立法、执法和守法层面存在的问题而言,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加以完善:构建与生态文明建设与时俱进的环境法律体系;建立专门化的环境执法机构,实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律效果;培养公众生态环境意识,拓宽参与环境法律监督渠道。另外,就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环境犯罪立法问题,周宁在提交的论文《论区域模式下的环境犯罪立法——以云南生态文明建设为视角》中认为,法律是生态文明建设顺利开展的重要保障,我国现阶段虽然已将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污染环境行为纳入刑法规范范畴,但是由于环境犯罪立法经验不足,环境犯罪法还有待进一步完善。此外,该论文也对云南环境犯罪的监管、生态文明建设的法律制度保障做了探讨。

生态文明建设涉及每个人的具体利益,随着人们生态意识的兴起与对环境问题关注程度的提高,因环境利益而引起的纠纷也日渐增多。本次论坛中,陈铭聪援引台湾地区首件环境公益“台东

杉原海岸美丽湾度假村开发案件”,批判了台湾经济发展中政府与开发商勾结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做法,并指出随着生活的改善与公民意识的提升,公众在环境保护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应充分发挥其在生态维护中的作用,并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在历史上因涉及个人利益而导致的环境诉讼案件方面,王璐在《光绪初年吐鲁番地区的民法实践(1877—1884)——基于地方民事诉讼案例的分析》一文中,以地方民事诉讼案件的分析为视角,对光绪初年新疆吐鲁番地区出现的多起民事案件中地方府州、吐鲁番同知以及乡约、阿訇、台吉、伯克等在民事案件处理中的作用和影响等做了梳理与分析,认为吐鲁番地区这些民事的问题处理方法值得同样作为民族地区的云南的生态文明建设所借鉴。

四、结语

韩茂莉认为:“由于人类自身对环境变化的感知能力与能动性反应,人类调整生产与生活方式的每一个行动,都可以作为人地互动信息的反映,成为深入认识地球系统长期持续利用与全球变化趋势的依据。”^[6]因此,无论是环境史抑或是生态文明的研究及建设,都需要反思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周琼指出:“2007年中共十七大后,生态文明作为全新的常用词,与“美丽中国”相协互动,在各项方针政策、规划、法规中高频出现,占据了各类传媒的主版,成为区域社会发展及经济建设的终极目标。各地的建设路径及方案在示范区建设中成绩显著,正书写着当代环境史。”^[7]事实上,生态文明与环境史的研究及建设的兴起离不开当下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就云南地区而言,2015年1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时强调,云南要努力建设成为民族团结进步的示范区及生态文明建设的排头兵。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也正是本次“生态文明建设与区域模式”论坛的重要背景。

不仅如此,诚如王利华所言:“建设生态文明作为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系统工程所关联的问题复杂至极,远非某个单一学科所能解决,学人必须破开学科分隔的院墙,敞开思想交流的门户,积极互通声气,至乃抵掌共论。许多重要问题,唯有通过不同学科领域专家之间密切交流、合作,反复对话、磋商,方能求得正解,减少偏失。”^[8]由此看来,作为云南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理当需要敞开门户,加强与外界的联系。这也彰显出举办本次学术论坛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事实证明,经过为期三天的研讨,本次学术论坛在环境史与生态文明理论之间的内在关联、环境史研究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意义、云南环境史研究与生态文明建设区域模式等方面均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或建议,其理论与实践层面都有较大提升,对于推动生态文明与环境史的研究与建设具有较大意义。

【参考文献】

- [1]梅雪芹.从环境的历史到环境史——关于环境史研究的一种认识[J].学术研究,2006(9):12-22.
- [2]包庆德,崔思朋.生态文明建设与环境保护新常态前沿研究——2016年首届中国生态文明智库学术论坛述评[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106-113.
- [3]邓云霞.生态文明建设视角下云南生态形象的塑造[J].昆明学院学报,2016,38(1):49-56.
- [4]刘豪.生态文明建设对云南民族文化的作用研究初探[J].昆明学院学报,2016,38(1):66-72.
- [5]刘少航.当代西方视野里的中国生态文明[J].昆明学院学报,2016,38(1):73-78.
- [6]韩茂莉.2000年来我国人类活动与环境适应以及科学启示[J].地理研究,2000(3):324-331.
- [7]周琼.《环境史》栏目主持人语[J].昆明学院学报,2016,38(1):48.
- [8]王利华.历史坐标上的生态文明[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5):53-57.